

对手与盟友

[美] 高沃龙著

刘戟锋 袁南生 郑久平 尹庆军
王 静 周建设 刘晓燕 张来举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John W · Garver
Opponent & Ally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8 版译出

对手与盟友

[美]高沃龙著

刘载锋 袁南生 郑久平等译

责任编辑：沈恒炎

*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装

* *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40 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050—298—8

D · 63 定价：5.4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高沃龙 (John W Garver) 撰写的一部国际政治史专著。该书利用中苏所藏战时外交档案, 从中国民族主义与苏联对华政策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 对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及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 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的外交政策, 对当时的国际背景也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目 录

第一章 沉重帷幕——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政治关系	(1)
1.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民族目标	(1)
2. 斯大林与中国政治风云	(7)
第二章 强寇当前——蒋介石和斯大林结盟	(16)
1. 蒋介石和斯大林相同的安全利益	(16)
2. “互不侵犯条约”的幕后角逐	(20)
3. 蒋介石的苏联参战幻想的破灭	(26)
4. 蒋介石胁迫斯大林的新筹码	(32)
5. 武汉战役：蒋介石的最后努力	(39)
6. 蒋介石对诺门坎冲突的策略	(44)
7. 斯大林以援华代替对日宣战	(48)
8. 苏联援助与中国官场	(53)
9. 美苏援华比较	(63)
10. 控制毛泽东：蒋介石和斯大林的不成文盟约	
	(65)
第三章 历史机遇——毛泽东与斯大林冲突	(69)
1. 中国革命与苏联利益的矛盾	(69)

2. 斯大林把革命引向维护苏联安全	(71)
3. 毛泽东抗战策略与革命战略的统一	(72)
4. 毛泽东与斯大林“特使”的初次交锋	(77)
5. 斯大林的“清洗”模式和毛泽东高明的政治手法	(81)
6. 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南北大较量	(85)
7. 王明武汉败北：斯大林策略受挫	(90)
8. 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妥协	(93)
9. 蒋介石借苏限共战略的破产	(99)

第四章 战云密布——蒋介石与斯大林周旋

..... (105)

1. 斯大林拒不接受蒋介石的策略.....	(105)
2. 蒋介石离间苏日关系的百般计策.....	(113)
3. 弃权票引发的中苏关系危机.....	(118)
4. 斯大林暂停对华援助.....	(124)
5. 蒋介石的日本牌.....	(131)
6. 斯大林令蒋大失所望的立场.....	(136)
7. 蒋介石抗议斯大林的“背叛”	(139)
8. 蒋介石的低谷.....	(144)

第五章 艰难岁月——斯大林和国共合作 ... (146)

1. 毛泽东欢迎斯大林的灵活战略.....	(146)
2. 毛泽东巧妙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张.....	(150)
3. 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停止进攻共产党.....	(154)
4. 斯大林阻止毛泽东扩大革命力量.....	(157)
5. 斯大林、毛泽东和百团大战	(170)
6. “皖南事变”对斯大林的压力	(172)
7. 斯大林的折衷反应.....	(176)

8.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新谅解 (179)

第六章 新疆风云——毛泽东、斯大林、蒋介石的政治大三角 (181)

1. 斯大林假手盛世才控制新疆 (181)
2. 战略通道和势力范围 (184)
3. 毛泽东在新疆的力量 (187)
4. 蒋介石的外交抗议和军事封锁 (192)
5. 大军阀的忏悔 (196)
6. 新疆大撤退 (204)
7. 屠党之变 (211)
8. 蒋介石控制新疆 (213)

第七章 国际棋局——中国政局与世界战争

- (216)
1. 苏日中立和蒋介石的对策 (216)
2. 假道危机和重庆情报局 (223)
3. 蒋介石策略大转弯 (228)
4. 大国之梦和潜在的革命 (230)
5. 不寻常的开罗晚宴 (235)
6. 蒋介石的美国牌和剿共反苏方略 (238)
7. 罗斯福斡旋 (245)
8.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较量 (248)
9. 蒋介石和雅尔塔协定 (251)
10. 外蒙问题纠纷 (258)
11. 波茨坦“赌场”：蒋介石败北 (269)
12. 体面的妥协和实质性退让 (272)
13. 外蒙独立的影响 (277)

第八章 内战前夜——毛泽东摆脱斯大林控制	
.....	(280)
1. 斯大林的目标和毛泽东的迂回策略.....	(280)
2. 斯大林和延安整风.....	(288)
3. 内战之前的毛泽东、蒋介石和斯大林.....	(297)
4. 反法西斯同盟下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302)
5. 毛泽东的最后准备.....	(315)
6. 关键时刻斯大林的直接干预和毛泽东的灵活对策	(319)
第九章 民族英雄——历史的回答	(324)
1. 蒋介石为何失败.....	(324)
2. 毛泽东为何成功.....	(327)
3. 未来的历史前提：毛泽东、蒋介石和斯大林透析	(330)

第一章

沉重帷幕——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政治关系

1.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民族目标

本书所述，是中苏两国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定、骚乱迭起的年代，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在全民抗战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作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与民族优越感的综合产物，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引起了欧洲的关注与不安。法国革命那场摧枯拉朽的狂风暴雨已使以往对专制主义逆来顺受的广大人民开始主动地关心起“自己”国家的命运，这个转折一旦出现，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汇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所谓现代政治也就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西方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的回报，也可看成是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反应。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无情淘洗，中国人确立的信念是他们的文明无与伦比，是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但是尽管洋溢着这样一种民族优越感，除了在王朝更替的危机关头外，普通中国人却很少认同这个国家，他们也没有什么奢望要求这个国家更强大。只是随着西方

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才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1840 年，中英之间爆发了一场给中国人带来强烈羞辱感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之后，一些中国思想家为了增强这个国家抵抗西方攻击的能力，已开始为改革奔走呼号、摇旗呐喊，到 19 世纪 70 年代，受西方列强凌辱的羞耻感已广为蔓延，从而更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非改革不能强国、救国。不过直到 19 世纪末，这些观念才深入人心，从而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逐渐兴起。就此而言，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则可看作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

20 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成为政治活动中的通用语言。1911 年革命的核心之所在，就是要推翻积弱不堪的外族（满族）统治，恢复大汉民族的地位。结果，一个新的政府取满族专制而代之，在新政府领导下，普通百姓通过议会民主制，获得了部分参政的权利，

1911 年革命的头号人物孙中山，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之父。20 年代初，孙中山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系统地归纳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把它定义为中华民族对中华民国的忠诚。至于三民主义的目的，孙中山明确认为就是要拯救整个中华民族，也就是说，要使中国处于各国相平等的地位，使它能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确保中华民族的生存还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特别是在领土范围、风俗习惯及国家力量方面所享有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以往曾远远优于其它民族。孙中山认为，即使到本世纪 20 年代，中国文化仍然是高人一筹的。但是，就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当欧洲科学技术异军突起之时，中国即逐渐丧失了它的民族优越感。因此，中国唯有按照欧美等

国的发展路径前进，主权才不致沦丧，中华民族才不致最终毁灭。

孙中山的思想对 20 世纪初的青年蒋介石有极大的影响。作为 1919 年凡尔赛和约不平等对待中国的结果，“五、四”运动造成了一大批民族主义者的反帝倾向。到 20 年代中期，包括大部分学生、商人、企业家、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对西方的在华利益构成了强有力地挑战。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最初进入中国时，至少在形式上与民族主义恰成鲜明的对照。只是到后来，中国的革命家们才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融合大大增加了对后者的需求，而且正是他们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为这种融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是毛泽东和他周围的哲学家们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融合。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创立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将这种意识形态运用于中国知识界的价值，因为中国知识界孜孜以求的是中国文化既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苏联的独立性。

毛泽东本人也是通过民族主义而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有可能遭受大灾大难，从而沦为无国可依的奴隶（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亡国）这样一种命运的忧虑。到 20 年代中期，毛泽东主要地已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了，他已成了一个革命家。但纵观他的一生，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931 年 9 月沈阳事件之后，日本入对满洲的入侵，以及随后的五年里日本人在华北的扩张，极大地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义愤。早先为政权而斗争的各派迅速变为怎样借助苏联民主集中制以笼络民族主义者的政党。在这当中，首屈一指的无疑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随着 30 年代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政治进

一步演变为民族主义政治，国共两党斗争往往围绕谁是中国民族主义利益的合法忠实代表这一中心而进行。为了在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夺取政权，两党都不得不提出一套旨在取信于民、拯救民族的纲领和政策，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以充分利用由这些纲领和政策激发起来的普通群众的革命热情。1935 年 12 月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及其广泛影响，乃是这种群众觉醒的极好说明。一年以后的西安事件则反映了民族主义热情的进一步高涨。

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热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他的反共军事计划束之高阁，转而迎接日寇的挑战；它也迫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只好暂缓其革命主张，其中包括推翻蒋介石政府的主张，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屈居次要地位。残酷的政治现实，特别是民族主义观念的力量，意味着无论是哪个党，都无法被单独看作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

在 1937 到 1945 年的抗战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已进入白热化状态。日本军队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外族统治卷土重来的可怕前景，以及中国社会四分五裂的残酷现实，都深深地震撼了各阶级阵营。即使普通的中国百姓，也在抗日问题上别无选择。随着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深，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民族的命运在召唤着勇敢顽强的抗战行动。随着危机的发展，三支不同的力量——国民党，共产党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政权——也为民族主义代表的合法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看到了这种民族主义热情的重要性，并且都力图将本党确立为中华民族唯一忠实可靠的代表。确实，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核心就是为这种民族代表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与此相应，每一方的宣传机器都大肆攻击另一方在民族利

益上的背叛行为。国民党添油加醋地把共产党说成是俄国人的傀儡，是苏联在中国的第五纵队，认为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就是苏联人的天下，它与满洲国（日本人于1932年在满洲建立的傀儡政府）或日本人在华北建立的其它“政权”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共产党则指责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列强附首贴耳。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阶级实质既然如此，也就注定了它不能领导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坚信自己的指责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他们都真诚地坚信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合法代表，并且是唯一忠诚的代表。

双方的抨击随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时强时弱，这种政治态势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热情的不可抗拒。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不管哪个党派制造摩擦，或是破坏统一战线，都将被看作是民族的叛徒，是将狭隘的党派或意识形态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的犯罪行为。

然而，不管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在一面严密注视对方的动静，一面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双方都以民族利益为依据，谴责对方的冒犯行为，并为自己辩护。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壮大，仅仅是爱国的抗日力量的壮大，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乃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共产党人打破蒋介石的限制，乃是爱国主义行为，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另一方面，蒋介石则采取种种军事、政治与经济措施反对共产党人，认为这些措施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是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共产主义的扩张就会导致要么对日本妥协投降，要么是苏联对中国部分或全面的控制。双方使用的都是能激起群众民族主义共鸣的过激言辞。

当然，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政治中，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当我们说到国内政治文化以民族问题为核心时，诸

如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和阶级矛盾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农村，宽泛的、高度抽象的民族利益往往被摆在狭隘的乡土利益之后。但即使如此，农村中的民族主义也在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毛泽东的革命致胜战略之一，就是通过民族主义的动员，发动城市知识分子去农村，以组织、教育和领导狭隘的农民阶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溶为一体，唯有这两者的整合者是致胜的关键手段，任何顾此失彼的片面做法都将招致失败。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状况表明，谁想统治中国，谁就得为民族利益说话；但国际社会的状况同时也表明，谁想统治中国，谁就得善于与盘踞在中国周围的列强妥协。在这当中，首屈一指的是日本和苏联。苏联是影响国共两党的一个重要因素，舍此将无法理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对苏政策。在蒋介石看来，苏联乃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关键之所在，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是蒋介石思考对苏政策的焦点。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接触影响极大。同样，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也深受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状态的影响，而且，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政策也不能不考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关系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它们的考察不能避实就虚。

当然，抗战时期影响蒋介石、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国际秩序并非铁板一块、永恒不变。恰恰相反，从1937年到1945年，构成国际秩序的诸列强——苏联、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结盟模式实际上经过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策是广泛联合，一致反对德国和日本。1936年12月，柏林和东京在反对第三国际条约的名义下，结成了反苏联盟。斯大林则以对西方民主的

赞颂倡导集体安全，以反对法西斯主义。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尽管没有接受斯大林的集体安全主张，但仍然坚持了广泛反对德、日侵略的政策。

第二阶段开始于1939年8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大约与此同时的德日友好关系的恢复。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的苏联直接进入了与轴心集团的联盟。

第三阶段开始于德国对苏联进攻，以及英美等国对莫斯科采取紧急救援之时。这种大联盟直到战争接近尾声时才发展为全球性的，才扩展到远东。

1945年4月，斯大林撕毁了与日本的中立协议，并于4个月后对日宣战，从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秩序推进到了第四阶段。

蒋介石、毛泽东的对苏政策不能不随国际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他们的外交方针必然是此一时，彼一时。某个阶段，他们也许能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但到下一个阶段，他们也许得不到斯大林的支持甚至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在整个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毛泽东在追求民族目标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性，从表面上看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方针政策各不相同，但他们追求的目标却不是可以改弦更张的。也许，这种目标追求的恒稳定性应归因于抗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应归因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明白谁也不能公然违背民族意向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2. 斯大林与中国政治风云

也许，蒋介石、毛泽东争取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最有效的办

法，是抛出一套民族复兴的纲领。这些纲领的社会经济内容大相径庭，但都声明自己的目的是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

蒋介石的民族复兴纲领也要求在军事上打败日本。早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得出结论，认为国内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日本人得寸进尺的侵略将使一切和平幻想化为泡影。而无论是对巩固他的国内政治地位来说，还是对遏制日本人的野心来说，日本的军事失利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当然，蒋介石并不曾想到日本人会遭受1945年那样的惨败，但他确实希望通过一场有限的军事胜利迫使日本与以强国面目出现的中国握手言和。

蒋介石复兴政策无疑损害到苏联的在华利益。1919年，苏联曾正式放弃了它按照19世纪条约从中国获得的特权。1924年，当中苏关系正常化时，这种放弃进一步得到了确认。1935年，中国将东部铁路卖给日本，从而使苏联在满洲特权的最后残余清除一空。但是，按照蒋介石的看法，中国的大片领土仍在苏联人控制之下，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疆与外蒙古。很明显，中国如果想收复这些失地，就必然与苏联的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苏联也对满洲的未来深表关心。1904年，为了这大片矿藏丰富的地区，同时也为了这里具备对苏联海军来说最理想的不冻港，沙俄曾与日本兵刃相见。1929年，为了维护在满洲的特权，苏联也与中国发生过短暂的交火。直到1935年，为了避免与日本开战，斯大林才非常勉强地放弃了这些权益。满洲国建立之后，斯大林认为，一旦日本人被打败，它能否完璧归赵，也许就成为问题。因此，从苏联的利益来看，最好的结果莫过于存在一个独立的、同时又顺从苏联的满洲了。

蒋介石也相信，苏联的合作对打败日本人是重要的。中国

的军事力量太弱，难以独胜日寇，因而不能没有其它列强的支持。1937年，蒋介石曾表示希望美国和英国能支持中国，从经济上和财政上采取对日制裁措施。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年里，蒋介石外交方针的着眼点一直是推动对日本的制裁。到1940年时，这些努力获得了结果。但是，即使在1937年，蒋介石寻求军事援助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华盛顿或伦敦，而是莫斯科。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争夺亚洲东北部，在历史上就势不两立。况且，1931年之后，苏日关系一直危机四伏，特别是“9·18”事变之后，两国几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在30年代，苏联的军事与工业实力也迅速扩张，当英美政府大幅度削减防务费用，错误地希望通过平衡预算来振兴日趋萧条的经济时，苏联的实力却随着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而迅速增长。9·18事件后仅仅两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就增加了四倍，达到40万人。从1935年开始，沿满洲到西伯利亚边境线的冲突，既反映了苏联远东兵力部署的增加，也反映了苏日敌对状态的加剧。所有这些，便使得蒋介石希望苏聟能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按照蒋介石的设想，一旦日本军队在华中地区受到钳制，加上美英等国采取友好的援助态度，苏联红军就能狠狠打击已经空虚的日军后方，从而苏联与中国的合作将赢得对日作战的彻底胜利。

日本失败后，如果中国要获得举世公认的强国地位，也不能没有苏联的合作。蒋介石甚至看到，即使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成员，也有可能在战后格局中受到怠慢，只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伙计。凡尔赛和会的教训时常出现在蒋介石的脑海里。为了避免1919年悲剧的重演，很明显，争取各列强特别是苏联的友好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压制却必然危及苏联的利益，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1919年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成立以来，苏联的对外政策就一直遵循着政府对政府、党对党的二元规则。受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是30年代苏联国家力量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给斯大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对仍处于虚弱状态的苏联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补偿。况且，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的重要成员，自从1933—1934年希特勒破坏德国共产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就仅次于苏联共产党，因此，蒋介石如果镇压中国共产党，无疑也会给苏联的在华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毛泽东也有一个民族复兴纲领。虽然象蒋介石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打败日本对中国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他的纲领又有独特之处，那就是他认为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才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唯有摧毁与外国帝国主义狼狈勾结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实力，才能斩断帝国主义控制和剥削中国人民的魔爪。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只有消灭剥削关系，才能调动起广大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而这种群众热情乃是国家财富与实力赖以增长的源泉。进而只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通过国家计划和中央积累资金，才能迅速而有效地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只有彻底进行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恢复它在国际格局中的崇高地位。

毛泽东试图通过社会革命而使民族得到振兴的纲领的实现，也受到斯大林的有力影响。毛泽东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他成功地将知识分子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得以夺取政权，并随后开始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在实施他的民族复兴纲领方面的成功，实有赖于他能否摆脱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